

显绩与潜绩

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与中科院领导座谈时表示,希望中科院能有更多的科技项目、人才、成果落户广东,以促进广东省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对于项目选择,“近期能马上出效益的我们需要,近期不能马上出效益的我们也需要”。

事实上,推动科技项目、成果落地转化,已成为许多高科技园区的重要工作内容。但在选择项目时,绝大多数园区都希望落地的项目马上能见效益。这种急功近利的思路,为成果转化埋下了隐患,因为许多项目的真实效益并不是显性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将使人们对项目效益的判断流于表面,而项目

所有者也会因期盼地方支持而粉饰项目效益。

广东省近年来推动了散裂中子源、大亚湾中微子试验等项目入粤。汪洋直言,不仅“看重显绩,更看重潜绩”。这样一些基础研究领域的大科学工程,必将凝聚众多的科技人才、高端仪器设备等创新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外溢必将对广东的创新起到重要作用。

事实证明,显绩与潜绩两者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显绩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潜绩的支撑,只有潜绩巩固了,显绩才有增长后劲。

一周评论

解决“两张皮” 关键在实践

■周熙檀

日前,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指出:“协同创新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是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美国硅谷之所以能诞生苹果、惠普、英特尔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地区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

他同时指出,近年来,我国产学研合作呈现出4个新特点:合作的层次不断提高、合作的形式不断创新、合作的趋向更加市场化、合作的路径更加多样化。

但是相比较而言,产学研合作固有的问题更为引人注目。

此前,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曾提出制定《产学研合作促进法》的建议。当时提及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和运行机制、利益分配原则、风险分配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等,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早在198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就提出:要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促进多层次、多形式的科研生产横向联合,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改革科技人员的管理制度,支持、鼓励科技人员走出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政府机构,从事发展经济的工作和创办科技事业。

然而直到今天,若干规定仍然高悬头顶,未能成为产学研结合的保护盾。几十年前的老问题,至今仍然摆在眼前待解。

首先,紧密联合的局面只有局部呈现。高校、科研机构认为,我们一直在努力,贡献也不小,但是,总摆脱不了各种催促甚至指责。“两张皮”似乎是一个定论,使得产学研合作陷入魔咒不得翻身。

其次,一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科学家走到市场的前沿去服务于经济建设,另一方面,科学家走出科研机构所需要的管理体制创新仍裹足不前。

虽然产学研合作不断推进,思想和社会都在变化,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于科技的需求也在增大,变化也在加快。

有学者认为,“这对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是社会发展中最高境界的难题”。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就是要依靠有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因此,与其把“两张皮”挂在嘴上指责与批判对方的短处,不如更多地看到对方的优势,更为积极地看待问题,在不同的评价体系内寻找协同创新的新思维和新路径。

与此同时,产学研合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某个机构简单协调解决,只有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才能协调和规范合作过程。

聚焦一流园区建设

在新技术经济模式下建设一流园区

■本报记者 周熙檀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世界一流园区建设,确立考量何为一流的标准十分重要。标准的确立,将为国内一流园区建设提供准绳。

但对于目前讨论中的世界一流园区指标,张纛有其自身的见解。作为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张纛把世界一流园区建设标准,定格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这一更高的层面。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世界一流园区?如果没有认清在什么背景下去建设一流园区,相关指标设立和工作推进将是不清楚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张纛直言,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局部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能仅仅从高新区发展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高新区要承担起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使命。”张纛说。

创新型国家建设使命

2005年6月17日,温家宝总理在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要求。他希望经过5-10年,或者再长一点时间的努力,能够把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武汉、成都六地的高新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园区,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作出重大贡献。

地处长三角的江苏省颇感失落。多年来,江苏省不断凝聚资源要素,推动省内形成众多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高地。苏州工业园、苏州高新区、无锡高新区、常州高新区等,在当时都已是国内叫得响的高科技园区。但在世界一流园区战略中,江苏省的高新区却无一进入建设序列。

“未来中国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实现这样一些目标,需要找一些抓手。”张纛认为,首批6个进入一流园区建设序列的高新区的遴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考虑了区域的平衡性问题,强调要从区域、区域到国家层面进行创新布局。

在国家的战略构想中,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并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张纛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建立创新型国家,一定是先从局部凸起,通过局部成功,带动一个区域发展。

高新区建设就是一个“局部凸起”。

“建设世界一流园区这项工作,是创新型国家建设非常重要、非常领先的步骤。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将形成从普通园区、创新型特色园区、创新型园区到世界一流园区的演变。目前中国高新区越来越多,沿着上述这样的路线不断往上发展,高新区带动的区域将会越来越多。而这样会在新的平面上有新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其产业布局、制度设计、体系构建等等,都要在新技术经济模式下进行。
图片来源:昵图网

的发展。”张纛说。

张纛所说的“新的平面”,是指基于创新的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中,高新区承担了载体的责任。高新区要推动创新从局域到区域再到国家层面的发展。

同时,这种创新是基于创新经济范式下的创新,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模式下的创新,不是原来传统模式上的创新,因而它的理念会有改进,工具和行为逻辑也必然会与传统的不同。

张纛强调说:“一流园区建设,应该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引擎去推动;一流园区的形态描绘,应该是创新经济的局域建设,是在新的技术经济模式下的创新试验田。”

新旧范式转换阵痛

可以说,中国的世界一流园区建设,肩

负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使命,又处在新旧范式转换的时代。因而,中国的世界一流园区建设没有可仿照、可借鉴的先例。“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的土地上,去做一个世界标杆性的创新经济的局域环境。”张纛说。

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原以为很快会过去。然而张纛在2011年10月就指出,未来10年是动荡的10年,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经济低迷,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这一时代的特质,是基于新的技术经济模式下的创新竞赛。

而这个新的时代来临前新旧范式的转换,必然是会有阵痛期的。

张纛说:“范式的变革,是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分析工具和运用工具的全面变革。范式变革带来的变化是深刻而全面的、革命性的。不同范式下的对话,极端地说是不同种类的对话;不同范式下的活动,看似有一些相似,

但因为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分析工具和运用工具的差异,结果将是差异巨大的。”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雷兹(Carla Petez)曾提出,这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ICT范式对大规模生产范式的替代。ICT是Information(信息)、Communication(通信)、Technology(技术)3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

张纛认为,在此次金融危机和全球衰退之后,所有国家都将在全球化背景和ICT范式下运行,无论是核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都将受到这一发展潮流的影响。这标志着全球将进入结构性过渡阶段。

因此张纛认为,研究ICT范式下的创新和竞赛与过去时代的创新有何差别,并且将这种新的认识贯穿到一流园区的建设中,是非常必要的。

世界一流园区之“眼”

张纛表示,世界一流园区,是立足全球视野的创新经济试验田。通过示范引领,世界一流园区将带领整个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达成创新经济全面开花的愿景。

事实上,这样一种道路,也是在新技术经济模式下,与世界其他发达和相对发达地区开展创新竞赛时唯一可能取胜的道路。

“这也是高新区在建设世界一流园区中,需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国家使命。”张纛说。

同时张纛还强调,世界一流园区一定要在某些细分的产业领域作出示范,并且力争在全球实现引领作用。但实际上,“如果到了细分领域,大家发现,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要成为领跑者非常困难”。

对于中国高新区来说,找到自己的“眼”非常重要。

“先期20年发展,高新区是靠优惠政策发展的,是吃偏食长大的。下一步没有偏食了,高新区怎么办?靠忽悠只能发展一时。”张纛不无担忧地说,“只有重新认识自己,同时重新认识世界,才能够清楚现在是什么形势,要用什么资源去做才能成功。”

2011年,科技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火炬工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开展“一个行动,两个工程”。“两个工程”是指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科技服务体系。关于这两个工程的具体内涵、导向、任务,目前都在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中。

张纛认为,这两个工程,既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工程,也是推动高新区加快发展的工程。但要实现高新区的全面战略提升,光靠这两个工程还远远不够。而且,要建设世界一流园区,这两个工程仅仅是开始的第一步,还需要新的设计。



专家观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 认清差距才能追赶世界一流

■本报记者 栢琪

今年2月,中关村一硅谷高端人才创业中心在美国硅谷建立。这一举动,旨在吸引国外优秀人才与技术,通过该创业中心直接与中关村对接。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现实空间中的大洋大海早已不能隔断不同地区之间的科技创新与交流。中关村“零距离”贴近全球高科技人才——硅谷,正是对世界一流园区最典型代表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析“世界一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环境是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关键要素。

“2+3”标准定义一流园区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硅谷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1700亿美元,占美国的1.2%,加州的近1/10;人均增加值约为13.5万美元。

硅谷的成功,是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也是美国强大国力的体现。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以及完善的金融体系,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资本,而硅谷一流的技术实力,也吸引了全球资本的关

注与合作。此外,硅谷的成功经验还包括: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扶持为辅助,以及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

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硅谷,依靠创新走出了低谷,依然处于全球高科技园区的前列。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表示:“很多人认为高新区是高新技术的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基地,新型企业家摇篮。其中第二点很关键,创业基地的提法同硅谷人的说法有些相似,他们说硅谷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即其地理、气候以及其他条件有利于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人才生活和繁衍。”

“我认为,世界一流至少应该是‘2+3’,即具有2个要素与3个特征。”赵弘说。2个要素是指,一流的园区要具有一流人才和一流环境。其中一流的环境,并非指物理条件,而是指园区文化。

“只有鱼塘修好,有了鱼,才能慢慢形成鱼群。环境一流,人才一流,才能诞生一流企业。而园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政策优化等都是为了打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环境,并用环境吸引、聚集人才。”赵弘说。

而3个特征则为:具有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具有一批有行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具有一批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

“2+3”,其核心还是在于企业。赵弘认为,多

个企业集中才会形成产业。产业发展是政府紧抓不懈的重点之一,但根基还是能否产生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条件不完善 创新路还长

“世界一流园区,我们可以学、赶、追。”赵弘认为。

从目前的一些数据来看,有些园区的部分指标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但实际上,在赵弘看来,这只是表面上的超越。他说:“打造一流园区的条件还不完善,我们要走的创新之路还很长。”

跨国指数,是综合评价企业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指标。目前国外一些高科技企业的跨国指数高达60%,而多数中国跨国企业的跨国指数仅为10%-20%。赵弘说:“尽管最近几年,我国各园区中上市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多,但是上市公司的质量相较而言还是有差距的。”

在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的过程中,目前,中关村、武汉东湖等园区走在前列。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园区的发展各自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全国高新区排名第一的中关村,赵弘认为目前便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体制创新该如何继续推进,以及如何